



中國考古學

論文集

張光直 著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張光直著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380元

著者	張光直
執行編輯	鄭秀蓮
發行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 · 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497-7(平裝)

前 記

這本書所收的十七篇論文，是我從1950年加入考古行列四十多年以來用中文所寫的文章裡面，除去已經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的以外，慎重選擇出來的。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57，此後有1959，1960各一篇，1977年的兩篇，其餘的便都是近幾年所寫的。我所寫的考古學的專書，都是用英文寫的。我自1955年就一直住在美國，自然要用英文寫書，在期刊中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一樣。但在這四十年中，我一直沒有與中國的考古學、人類學界失去聯繫。在七十年代以前，我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民族學研究所的集刊上發表了不少中文寫的論文。自八十年代大陸上的幾個學術刊物登載我的考古文字。我用中文寫的論文，是我和國內的同工學者交流學習的媒介。通過這個媒介，我也可以說是國內學術界的參與者，我的著作在國內考古學的發展上，也可能起過作用。所以這本論文集在中國考古學史上也可以算是一段紀錄。另外我還用中文寫過許多綜合性的考古論文，因為新材料和新研究，已經完全過時了，就沒有收入本書。

不過，我還是收進來一篇過時的文章，它已經完全不能代表我今日的看法了。這就是第四篇，發表於1959年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在這以前，中國考古學者相信在新石器時代有兩個平行的文化，仰韶在西，龍山在東。在五十年代，有河南陝縣廟底溝的發掘，在遺址上層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就叫做廟底溝二期文化，似乎是從仰韶到龍山的轉變期的一種文化。在1959年，安志敏和石興邦兩位先生在北京出版的《文物參考資料》十月號上面，我在臺北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共發表了三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出來一個內容很是相似的對中國新石器時代

文化發展關係的新解釋，即華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起源於豫西、晉南，和陝西關中地區，然後發展成爲龍山文化，向東擴展到山東和沿海地帶。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新石器文化發展史的理論。那時大陸和臺灣之間還沒有接觸，所以這三篇文章不謀而合地達到同樣的結論，可說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巧事。不久大陸上發生大躍進、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的運動，考古工作中斷，這個所謂「核心地區起源說」的理論，在國內外便一直是嗣後十餘年內的主流理論。到了七十年代的中期，由於碳素十四數據逐漸發布，使我們知道核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並不比「邊緣」地區爲早，同時大汶口文化的地位在山東確定了下來，證明雖然河南的龍山文化可能是從仰韶文化發展出來的，山東龍山文化的祖先卻可以在大汶口文化裡找到。這樣一來，核心地區起源說很快地便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被「區域文化多元說」所取代。這篇文章今天雖然已經不再適用，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收入本書，使讀者看看在三十多年以前，考古學者在當時所知道的材料的基礎之上，考慮了甚麼問題，用了些甚麼方法，怎樣得到這個在考古界稱雄一時的結論。本書裡沒有收入有關區域文化多元說新理論的文章，因爲我對這新說還沒有用中文寫過，但從第七篇論文，〈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讀者可以看到我較近的看法。

其他的十幾篇論文當然也有時代的限制。例如第十二篇〈「濁大計畫」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裡面所討論的臺灣中部史前文化的序列，今天不用說已有更新的材料，必須加以補充。但這篇文章的意義是跟著濁大計畫的歷史性而來的。關於濁大計畫的歷史意義，還沒有人詳細地討論過。我有一篇叫作〈追記臺灣「濁大計畫」〉，收入也是聯經新出版的《考古人類學隨筆》一書中，讀者可以參閱。

因爲有關三代考古的文章，都已收入《中國青銅時代》（第一、二集），所以這裡只收了兩篇。第十五篇，〈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說明我現在正在從事的一個考古發掘調查的計畫的背景。這篇文章裡面討論了我爲甚麼對商代故都的地點就在今日商邱地區這個傳統說法有很大的信心。我代表哈佛大學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商周考古的同人合作設定了一個長期的研究調查計畫，希望在商邱地區能夠至少找到早商或先商時代的一個城址。這項工作如有豐富的收穫，可能對中國古代史上

有些重要的貢獻。這個計畫的報告，只好有待來日了。

最後一篇文章，是我給李濟之先生身後在大陸上第一次出版的學術著作所寫的〈編者後記〉，也是我對李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的討論的一個嘗試。李先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對他的學術成就和建樹詳細討論的文章，還很少見。我希望這篇跋語在這裡發表，能夠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因為李先生在中國考古學上所作的事太多了，還需要有人作進一步的研究。

目次

前記

1. 考古學與「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1992)…………… 1
2. 考古學和中國歷史學(1981)(陳星燦譯)…………… 9
3. 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1994)…………… 25
4.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1959)…………… 37
5. 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1960)…………… 93
6. 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1994)…………… 111
7. 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1989)…………… 125
8. 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1987)…………… 157
9.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1987)…………… 171
10. 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1989)…………… 189
11. 「濁大計畫」與民國六一至六三年度濁大流域考古調查(1977)…… 207
12. 濁水溪大肚溪考古——「濁大計畫」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1977)… 233
13. 圓山出土的一顆人齒(1957)…………… 265
14. 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1989)…………… 273
15. 商城與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1994)…………… 285
16. 殷墟五號墓與殷墟考古上的盤庚、小辛、小乙時代問題(1989)…… 297
17. 《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編者後記(1990)…………… 311

1. 考古學與「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

在「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這一個大題目的下面來討論考古學，我們至少要牽涉到三個小題目：(1)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的建設上有沒有考古學的地位？(2)如果考古學在人類學這門學科裡占有一席之地，有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3)考古學的建設是不是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之所以「具有中國特色」上面能夠作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獨特的貢獻？這篇文章裡我就這三個小問題直抒己見。

一、人類學與考古學之間的關係

把考古學放在人類學裡面去的這種作法，是美國的習慣。美國考古學上有句名言，說「美洲的考古學便是人類學，不然它便什麼都不是。」這種看法是適合美洲考古學的現實的。美洲的人類雖然至少有一萬多年的歷史，但除了中美的馬雅文明以外都沒有文字記錄，而且即使馬雅的文字記錄所包括的範圍也只限於曆法的記錄與片段的王朝歷史。西方文明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便逐漸進入美洲，美洲的土著文化逐漸縮減，但直到今天美洲土著文化還是活的文化，是人類學者研究的對象，所以研究美洲考古的學者便不能不從人類學者研究的結果與資料出發。

* 原載陳國強主編，〈建設中國人類學〉（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92。）

舊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情況與美洲大不相同，所以人類學、考古學這些學科在學術分類系統中的地位也就大不一樣。首先，舊大陸的考古學是在歷史科學的溫床裡生產出來的。愛琴海古典文明的考古，是十九世紀後期德國人謝里曼根據荷馬的史詩在特洛伊奠基的，而中北歐的最初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是十九世紀後期的地質學家在地質層位裡辨認出來的。在中國，考古學的傳統基礎是建立在金石學上的，而金石學一向是史學的一個分枝。

舊世界人類學的產生，不論是體質人類學還是文化人類學（或稱民族學）與社會人類學，都是與西方文明的工業革命（十八世紀中葉），與繼之而產生的全世界的殖民活動分不開的。當西方工業文明伸展到亞、非及大洋洲與拉丁美洲時便與土著民族接觸，當即強烈意識到其人種上與文化社會上的分歧性，而人種學與民族學又成了學術上與行政上的需要，因而促成了這些學科在十九世紀的發展。這些學科傳入中國也是在歐洲通過翻譯開始的。據芮逸夫的記述^①：「最早的一部書是德國人寫的《民族學》，其書出版於1898年，兩年後，英國人洛伊將其譯成英文，稱為《文化人類學》。我國的林紓和魏易二人又將其從英文譯成漢文，稱為《民種學》，並於1903年（清光緒29年）由北京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官書局出版發行。但同年滿清政府學部訂頒的大學學制及其學科，在文學科大學各門學科『中外地理門』主課中，則將其稱為『人種及人類學』。」

既然舊世界學科系統中考古學與人類學來自不同的淵源，那是不是就說在人類學的討論當中應當沒有考古學的地位呢？學科的區分只不過代表我們對學術界內一種分類系統的認識，它是有時代性的，因為學科的分類系統是經常變化著的。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屬於歷史學範疇的考古學並不是不能在二十世紀的末期獨立起來或與人類學結合起來的，這主要得看從事考古學的人對自己學科的新了解、新認識與新的分類。但是在這些問題上，從業者必須作一番細心的檢討。討論的焦點應當是這樣的一個問題：考古學與人類學（在這裡當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密切結合起來對考古學有什麼益處？對人類學又有什麼益處？

^①芮逸夫，〈民族學在中國〉，《大陸雜誌》，3卷7期，頁203-206，及3卷8期，頁251-255，1951年。

因爲人類學家能夠觀察和分析現代的活的社會，它能夠把社會當做一個系統性的有機體來研究，能夠了解這個有機體各組成部分間的聯繫，甚至因果關係。另一方面，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是世界性的，它包括人類社會的各種不同的類型，所以人類學所分析出來的人類社會的有機系統性的構架也有種種不同的類型。換言之，人類學供給我們人類社會活動與社會結構的各種不同的藍圖。受過人類學訓練的考古學者在這兩點上要比沒有受過人類學訓練的考古學者占有優勢的地位：第一，他很自然的把考古資料當做「人」的活動遺跡來看而不僅只當做器物本身來看。第二，他知道要把考古遺物拼合起來從而復原古代文化社會，而其中哪些藍圖是可供參考的。後面這點有時會有人誤以爲用考古的資料去湊合人類學的理論，其實這是一種根本的誤解。用考古資料來復原古史，我們最終的依據還是資料本身，而絕不能把某種人類學的理論奉爲教條，拿資料去湊合。但我們對人類社會各種藍圖的了解，可以在我們復原歷史時從已知的各種模式中得到啓發。近年來甚至有考古學者專門研究現代民族中器物的形態和行爲，並把其作爲考古復原的參考，我們稱這種研究爲「民族考古學」。

反過來看，人類學者所觀察研究的現代文化與社會，是歷史的產物，對它們的了解需要相當的時間深度。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研究現代原始社會的學者，在這方面有無所適從的苦惱，因爲從一方面來說，作爲他們研究對象的原始社會都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資料的，所以他們只好使用各種擬測的方式，根據神話傳說來將他們的歷史加以復原。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又意識到這樣復原、擬測出來的歷史是缺乏客觀基礎的。迄今爲止，社會人類學者對歷史的態度，對研究原始民族的歷史的方法，還一直處於猶豫不定的狀態中。但是不論從理論上說這個問題應當如何解決，在實踐上社會人類學者在對過去的社會的研究上，在絕大多數情形之下是有歷史資料的，這就包括有文字記載的社會（如中國社會）中的歷史資料與沒有文字記載的社會（如大部分的美洲土著社會、大洋洲社會、非洲大部分社會）的考古資料。即使在有文字記載的社會中，他們的歷史也可以因考古資料而加強和延伸。換言之，考古學是供給人類學從事歷史研究的重要工具，甚至是主要工具。

根據上面簡短的討論，我們可以對文首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作一個初步

的回答，那就是說在「具有中國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類學」的建設上，是可以有考古學一席之地的。固然在中國傳統學科的分類上，考古學與人類學有不同的來源，在當代建設中國人類學的設想之中，依我們的拙見，是應當把考古學放在一起來討論的。

二、中國考古學的特點

如上面所說，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主要淵源是中國傳統上的史學以及作為傳統史學附庸的金石學。要了解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特點便不能不自傳統史學的特徵說起。中國傳統史學史是一門博大的學問，我自己不是學它的，在短短的幾段文字裡更不能將其精髓摘要說明，因此只能列舉下面這幾條公認的特徵。第一，中國傳統的史學所治的材料限於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第二，傳統史學資料的採取是個案式的，以歷史人物的傳記為主。第三，傳統的史學重視人物的褒貶，所謂「春秋大義」。（《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第四，傳統的史學因為有春秋大義，所以是供今人治世參考的，可謂「古為今用」。（《史記》卷六〈始皇本紀〉：「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②

從傳統史學到當代中國考古學中間相接的橋樑是宋代以來的金石學與民國17年到26年的殷墟發掘。宋代呂大臨自述他作《考古圖》（1092）的目的，是「探制作之原始，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劉敞《先秦古器記》中也說，「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乃能盡

^②杜維運，〈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載《史學評論》，第1期，1979年，頁25-39。

之。」這兩位北宋金石器的大師筆下，金石學便是史學的附庸，而王國維認為宋代學者對中國考古學實有開創之功，蔡元培在《安陽發掘報告》的序中也說：「我們現在做考古學的同志，不可忽略這個光榮的歷史。」^③安陽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肇始，它在把考古學維持在中國史學傳統之內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現代科學考古學固然是由西方的科學家輸入的，而中國本部最早發掘的考古遺址是周口店和仰韶村，但中國考古學家自己主持和作大規模、長期發掘的遺址卻是殷墟（1928年）。如果中國考古學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或其他史前遺址最早進行大規模、長期的發掘的話，以後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很可能會走相當不同的道路，它可能會從歷史學的範圍中走出來，而與自然科學作比較密切的結合。但殷墟是歷史時代的遺址，殷墟最初的發掘是由對甲骨文的尋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的研究更是文獻史學的延伸。李濟在他總結殷墟發掘成果的一篇文章^④裡說，殷墟發掘造成中國史學界革命性的變化，但他所指的變化主要指「地下材料」的增加，而殷墟發掘的主要收穫在「累集的史料」。李濟列舉殷墟發掘的價值如下：(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實性及其在中國文字學上的地位；(2)將史前史的資料與中國古史的資料連結起來；(3)對於殷商時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階段作了一個豐富而具體的說明；(4)把中國文化與同時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連結，證明中國最早的歷史文化不是一種孤獨的發展，而實在是承襲了若干來自不同方向的不同傳統，表現了一種綜合性的創造能力。這幾點都很富見地，但他忘了說明殷墟發掘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考古學的傳統。這是李濟偶然的忽略，還是殷墟發掘在方法體系上仍然脫不開傳統史學的窠臼，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上面的討論令人想到中國當代考古學界中所討論的「中國學派」的問題。這個說法是1981年蘇秉琦最先提出來的，據俞偉超和張忠培的綜合，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包括下面這三個特點：(1)「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考古材料出發，運用考古學的手段，仔細觀察與分析考古現

^③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50年，頁63-79頁。

^④李濟，〈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期，1969年，頁913-944。

象所呈現的矛盾，具體的研究中國境內各種考古學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些內容的社會面貌及其發展階段性」；(2)「在科學發掘的基礎上，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分區、分系、分類型地研究各種考古學文化發展過程，……研究……中國……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3)「這種研究是以揭示歷史本身面貌作為自己的唯一目的，對促進人民群眾形成唯物主義歷史觀，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民族團結思想情感有著重要的作用」^⑤。仔細咀嚼這幾點的涵義，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精髓是沿著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一貫下來的：以中國為對象，以新的春秋大義為目標，以文化個案為基本資料，以對現代群眾的教育為目的。

三、考古學對「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的可能貢獻

從上面的討論來看，考古學在中國是歷史科學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並且輔助文獻史料重建古代史。根據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資料，我們可以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的程序與動力，並且可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化與社會的內容，也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底層。由於中國文明的古老與連續性，這些中國史前史與歷史發展的資料是極其豐富的，在世界史學界裡占很大的分量。

文化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是產生在對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的基礎上的。西方人類學家最初研究的對象是沒有文字歷史或罕有文獻資料的亞、非、大洋洲與拉丁美洲的原始社會，所以西方人類學（與社會科學一樣）的理論和方法論，一般來說，是有點忽略了歷史深度的。這一點我上面已經提到過，去年我在為陳其南所著的《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一書所作的一篇小序中，曾對這一點作過下列的論述：

社會人類學自從在西方誕生以來，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沒有文字和歷史記載的社會，因此它所發展出來的一些有關社會文化變遷的

^⑤俞偉超、張忠培，〈探索與追求〉，載《文物》，1984年（1），頁1-9。

理論系統和研究方法，都基於所研究的對象沒有信史這一前提。數十年來，社會人類學者把西方這一套方法和理論介紹到中國來，但一直都還沒有機會處理如何將這些理論和方法與一個有悠長文字記載的歷史社會相結合問題。向來研究漢人社會（尤其是臺灣漢人社會）的中外人類學家都以當代的社會現狀為研究對象，而很少想到如何將臺灣漢人的社會人類學研究與臺灣史研究結合起來，以及結合起來以後這種研究對社會人類學這門學科在理論和方法上可能有的新的貢獻。實際上有不少人已逐漸意識到，目前在整個社會人類學的領域之內要作嶄新的、有創造性的貢獻，唯一的機會，是如何針對像中國這樣有歷史時間深度的社會，利用其文獻資料來研究文化社會變遷的問題。把社會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則對彼此都會有所啓發的^⑥。

這裡所說的「歷史研究」當然包括考古學的研究在內。事實上，從考古學研究上所看到的中國文明起源的程序與動力已經在社會科學上對文明國家起源的一般理論有很鮮明的啓示了^⑦。把包括考古學在內的中國史學研究作為驗證與創造一般理論的一個基礎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的一條大路。

⑥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公司，1987年），頁4-5。

⑦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載《九州》，1986年，頁1-8。



2. 考古學和中國歷史學*

作為一種通過物質遺存對過去所做的系統調查，中國的考古學和它所研究的文明一樣古老。不過，傳統上它僅僅是中國歷史學的附庸。近代以來，田野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始從西方傳入中國。最近這些年，新的考古發掘給我們帶來大量的新材料，它們正迅速地改變著中國的歷史面貌。但是，儘管有著這樣新的科學的背景而且聲譽日隆，考古學在中國卻依然是歷史學的一種工具，縱使作為工具，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中國的歷史學似乎是獨立於中國歷史之外的一個實體：它不因改朝換代而稍有終止。正如余英時所說的那樣，「中國文學史具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源遠流長，一是史學傳統一脈相承，不因政治社會的變遷而中斷。」^①不過，歷史學不斷地從新的技術，新的理論和方法中取得營養。其中的一些技術和方法便是通過考古學的途徑而來。以考古學研究中國歷史，有兩個十分重要的標誌：一個是完成於公元1092年的呂大臨的《考古圖》，它標示著中國傳統的古器物學的開始；再一個是1920年中國石器時代遺址的首次確認，它揭開了中國科學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中國考古學的三个階段：古器物學（1092 - ）、科學考古學（1920 - ）和社會主義中國的考古學（1949 - ）之前，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傳統的中國歷史學的一些主要目的和特徵，這是因為中國考古學的目的

* 譯自：World Archaeology, Volume 13, No.2 (October 1981). (陳星燦譯)

①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頁172。

的和特徵與其大同小異，可以相互觀照。

首先，傳統的中國歷史學有顯明的道德價值取向。已故的瑞德（Authur F. Wright）曾這樣問道：「爲什麼歷史研究（在中國）受到如此的尊崇？它的價值取向何在？」他認爲，「其一，歷史上的成功與失敗，給研究者的時代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因爲儒家文化傳統，視歷史研究爲吸取相關經驗的法寶。其二，如果說體現傳統智慧的儒家經典，爲人們提供了行爲的準則，那麼，歷史研究就給這些準則在人事上提供了具體的事例和證明。增補歷史的記錄，便是參與了一項由聖賢們開創的偉大工程，研究歷史，便是試圖通過大量的具體事例，理解古人遵循或者背離儒家道德說教的因果報應。」^②因爲歷史記錄了以往的經驗教訓，所以爲後人指出了方向。正如公元前二世紀後期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學家希望以此喚起人們尤其是統治者的榮辱感和對其身後名譽的關心。據說孔子編纂《春秋》的時候，「亂臣賊子」非常害怕他們的罪行和醜事被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由於中國歷史學的道德價值取向，最好的歷史著作，不會任意地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而更改自己的立場。在儒教成爲不變的正統之後，歷史學也形成了與其相應的一套規則，並且變成爲一個獨立的存在。其實，不受短暫的外部干預的歷史學的獨立性，在官方的儒教形成以前很久既已存在。這可以《左傳》記載的發生在公元前548年的著名故事爲證。該年五月，崔杼殺死了他的主人齊莊公。主事的史官因此記道：「崔杼弑其君」。崔杼生氣，把這個史官殺掉了。史官的弟弟秉承其兄做了同樣的記述，因而也被崔杼殺害。他的第二個弟弟也落了個同樣的下場。最後，史官的另一個弟弟又秉筆直書，崔杼無奈不得不聽之任之。這個故事的下一部分更有意思。據說住在齊國另外一個地方的史官，聽說主史官們全被殺害，他抱著竹簡來到主史官受害的地方，準備再把崔杼弑君的故事如實記載。只是當他知道此事已經記錄在案，他才心安返家。

②Wright, Authur F., "On the Uses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izations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d. Louis Goeeschal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37-38.